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柳 若 梅

内容摘要: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关键词:北堂西文书目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 北京天主教传教士

《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①是北京天主教堂(即西什库天主教堂)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古籍善本书目,这些图书是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法国传教士和罗马天主教教廷传信会传教士留下的遗产。该书目的编者惠泽霖神父(C. M. H. Verhaeren)在其撰写的《北堂书史略》^②中提到,北堂书分为四类:一是天主教北京南堂、东

①H. Verhaeren,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②*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p. V-XXVII. 中译文见惠泽霖原著,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49年,第16-34页。

堂、北堂、西堂这四堂的全部遗存图书;二是嘉乐主教(Mgr. Mezzabarba)、索智能主教(Mgr. de Souza)、圣方济第三会汤士选主教(Mgr. Gouvea)藏书;三是内地传教团并入的 10 家小型藏书;四是姓名不详的一些传教士留下的和来源不明的藏书。这些书在 19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遭驱逐之际全部集中到了南堂即葡萄牙天主教南堂,住在南堂的北京最后一位欧洲天主教神父——葡萄牙遣使会主教毕学源神父(Caetano Pirès Pereira)将这批图书委托给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所以在俄罗斯人的记述中常常称之为“葡萄牙传教士团的图书”。

无独有偶,在俄联邦外交部档案馆收藏有一份标题为“葡萄牙传教士藏书目录”的档案资料^①,开本约 21cm×29.5cm,硬纸,共 54 页,正反面书写,即共 108 面。该档案为一大册档案夹中的一部分,从这个大册档案中的第 91 页起,最终页码为第 144 页背面。所以该档案有两个页码系统,第一种系统是本书目所在的档案册的页码系统,即起始于第 91 页,终止于第 144 页背面;第二种系统是本书目正文的页码系统,书目正文起始于第 1 页,终止于第 51 页。按第一种页码系统,第 91 页至第 92 页背面为俄国东正教使团用俄文为该批藏书所作的表格式分类目录。表格第一行不分列,以俄文书“类别与页码说明”(Указание Отделов и страниц)。第一行之下的内容分三列,不分行。第一列为“类别”(Отделы),之下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序号。第二列,与第一列中的序号相对应的位置,是以俄文书写的类别名称,如第一列序号 1 的一行,在第二列中就是“圣经书籍”(Книги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第三列为“页码”(страницы),之下是该类书籍在本书目正文中的页码位置。书目正文也按这种表格的形式编排。“类别与页码说明”实际就是该书目的目录。目录部分只进入第一种页码系统,形态和内容如下表 1(笔者将之由俄语译成了汉语):

表 1 类别与页码说明

类别		页码
1	圣经类书籍	1
2	圣经故事	1 背 ^②
3	圣经阐释	1 背,2
4	圣经重要词语索引和圣经阅读资料	2 背,3

①俄联邦外交部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资料,Ф. ГА 1-5, оп. 4, г. 1823. Д. 1 (п. 44), л. 91-144 об.

②此处是本文作者为表格中文字简便起见而将“第 1 页背面”简化书写为“1 背”,下同。

(续表)

类别		页码
5	教会神父和训导师书籍	3
6	神学家著作	3 背
7	神学体系和教程	4,5
8	教义问答	5 背,6,7
9	神学教义和分析	
10	神学辩论	7 背,8
11	神学	8 背,9,10
12	牧教神学	10 背,11
13	苦行禁欲	11 背,12,13
14	耶稣会、其章程和规则	13,14
15	教会决议	14 背
16	教皇令	14 背,15
17	教规法	15,16
18	教会演讲学	16,17
19	灵修	17,18,19,20
20	教会祈祷、仪式、节日	20
21	教堂祈祷书籍	20 背,21
22	伊斯兰教、异教、神话	21 背,22
23	哲学论著及其阐释	22,23
24	哲学教程	23
24 副	逻辑、辩证法	23 背
25	玄学	23 背
26	道德哲学	23 背
27	哲学史	24
28	古代数学家著作	24,25
29	现代数学家著作	25
30	普通数学	25 背,26
31	算数,代数	26

(续表)

类别		页码
32	几何	26 背
33	三角	27
34	高等解析	27 背
35	数学公式表	27 背
36	普通天文学	28
37	天文学教程,民间天文学	28 背
38	物理天文学	28 背,29
39	特殊天文学	29
40	实用天文学	29 背
41	宇宙学,数学地理学	29 背
42	星座目录和星图	29 背
43	天文学公式表格	30
44	星历表	30
45	天文学公式表格	30 背
46	天文学和数学工具	31
47	日晷学	31 背,32
48	地球仪的应用	32
49	数学和天文学的各种定理	32
50	占星术	32 背,33
51	物理	33
52	气象学、磁学、电学	33 背,34
53	化学	34
54	自然魔法、物理和数学中的有趣命题	34
55	炼金术	34 背
56	普通自然史	34 背
57	矿物学、冶金学和采矿艺术	34 背
58	植物学	35
59	植物学体系和教程、植物解剖与生理学	35

(续表)

类别		页码
60	动物学	35 背
61	动物解剖与生理学	35 背
62	人体解剖与生理学	35 背
63	著名医生著作全集	36
64	卫生学、普通病理学和内科学、诊断学	36
65	特殊内科学	36 背
66	外科学和产科学	37
67	生药学、制药学和处方学	37
68	医学定理	37 背
69	通俗医学、相面术	38
70	普通地理学	38 背
71	特殊地理学	38 背, 39
72	古代地理学	39
73	旅行	39
74	古代历史学家	39
75	历史论著	39 背
76	普通历史学	39 背
77	国家和城市的特殊历史	40
78	个别时期和事件的历史	40
79	普通教会史	40 背
80	个别教会和地方的历史	40 背
81	耶稣会历史	41
82	圣徒行传	41, 42
83	著名人物传记	42, 43
84	历史实例	43
85	古代风俗、道德等研究	43
86	历史编年	43
87	年表	43 背

(续表)

类别		页码
88	日历	43 背
89	政治	44
90	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理论、礼貌	44
91	法理学	44
92	普通军事艺术、战略学	44 背
93	军事实践	44 背
94	航海	45
95	工程艺术	45
96	大地测量学	45
97	工艺学	45 背
98	机械技术、计量学	45 背
99	理论机械、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	45 背
100	农业和农业经济	46
101	建筑学	46 背
102	雕塑、美术、绘画	46 背, 47
103	透视	47
104	音乐和歌唱、乐谱	47
105	语言艺术、希腊和拉丁经典作品	47, 48
106	最新拉丁语	48
107	欧洲语言	48 背, 49
108	辩论、作诗指南、诗歌样例	49
109	词典	49
110	语法学、文选和对话	50
111	语文学语论	50
112	汉语、埃及文字、标准字	50 背
113	教育学	50 背
114	百科全书	50 背, 51
115	学术团体论集、杂志	51

(续表)

类别		页码
116	印刷和杂类	51
117	书目	51 背

书目正文中,类别名称以俄语书写,所有图书条目均以拉丁文书写,著录内容包括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时间、藏书册数,全部图书共 3348 种,单种图书有的仅藏 1 本,大部分藏有多本,甚至有些类别的图书,如第 11 类神学图书中,最多的单种图书藏有 18 本。惠泽霖在《北京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的序言中提到,狄仁吉统计俄国归还的图书是 5400 册,就是因为藏书中有单种图书藏有多本的情况^①。以上图书中,出版于 1484-1550 年间摇篮本图书共有 58 种,其中包括 1534 年出版于科隆的加尔都会·戴奥尼索斯的《摩西五书详解》^②、1536 年出版于巴黎的加尔都会·戴奥尼索斯的《四圣史详解》^③、1533 年出版于科隆的加尔都会·戴奥尼索斯的《所有保罗书信评论》^④、1536 年出版于科隆的加尔都会·戴奥尼索斯的《圣经中所有信件,以及使徒行传、启示录详解》^⑤、1538 年出版于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那乌西亚的五卷本《宗教会议事务》^⑥;16 世纪图书 581 种,17 世纪图书 1762 种,18 世纪图书 858 种,19 世纪图书 37 种。书目中还有一些图书没有标注出版年份。

在 51 页背面(按第一种页码系统是 143 页背面),全部图书举目完成之后,在书目末尾有三段小字,第一段是:“前任使团团长按此书单完整交出。——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Поликарп)”;第二段是:“新任使团团长按此书单交接。——使团监督官科瓦列夫斯基(Е. П. Ковалевский),1850 年 1 月 2 日”;第三段是:“新任使团团长按此书单完全接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1850 年 1 月 2 日”。修士大司祭是每届俄国东正教

①H. Verhaeren,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 t'ang Library, p. XXV. 中译文见惠泽霖原著,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第 33 页。

②Dionysii Carthusiani, *in Pentateuchon enarratio*. Coloniae. 1534. f°. 中译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孔德媛所译,以下注释③④⑤⑥书名均为孔德媛译。

③Dionysii Carthusiani, *enarrationes in quatuor Evangelistas*, Parisiis. 1536. f°.

④Dionysii Carthusiani, *in omnes beati Pauli Epistolas commentaria*, Col. 1533.

⑤Eiusdem, *in epistolas omnes canonicas, in Acta Apostolorum et in Apocalipsin enarrationes*, Col. 1536.

⑥F. Nauseae Blanci campiani, *Rerum Conciliarium*, libri quinque, Lipsiae. 1538. f°.

驻北京使团团长的东正教职级,波利卡尔普是1840-1849年间驻北京的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此时即将离任,因而是“前任使团团长”。也就是说,波利卡尔普在北京任期即将结束时,与新一届使团的交接工作内容中有关于这批图书的交接。从第五届东正教使团起,俄国方面设立了监督官护送新使团来北京,组织新旧使团的交接工作,护送旧使团安全返回俄国。护送第十三届使团的监督官是科瓦列夫斯基。第二段小字显示,1850年1月2日,在监督官科瓦列夫斯基见证之下,前任使团团长将这批书完整交给了新一届使团团长。科瓦列夫斯基护送抵达北京的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是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第三段小字显示,巴拉第完成这批图书的收验后,于1850年1月2日在书目上签字^①。

第51页背面之后,没再按第二种页码系统标注,只有第一种页码系统的页序号即第144页,以一段话开始:“在1850年使团回国后,根据亚洲司1849年5月6日第1814号文件批准,从以上书目所列举的书中,选取如下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著作运往俄国,用于布尔科夫天文台。”接着列举了14种数学著作(其中摇篮本图书3种、16世纪图书6种、17世纪图书4种、无出版年图书1种)和29种天文学著作(其中摇篮本图书6种、16世纪图书5种、17世纪图书16种、18世纪图书2种)。这43种图书现在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布尔科夫天文台图书馆,其中包括1543年在威尼斯出版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修订的《锡拉库萨的阿基米德文选》^②以及1502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占星经典:托勒密的《占星四书》和《占星百言》、贺密士的《占星百言》和贝森的《论恒星》^③。

也就是说,1860年俄国方面归还给北京天主教传教团的图书共有3305种,其中摇篮本图书49种、16世纪图书约570种、17世纪图书约1742种,18世纪图书馆约856种,19世纪图书约37种,还有一些缺失出版年份页的图书近百种。

①俄联邦外交部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ИДРФ)资料:Ф. ГА 1-5, оп. 4, г. 1823. Д. 1 (п. 44), л. 143 об.

②Archimedis Syracusani opera, per N. Tartalian emendata ac in luce posita, venetiis 1543, 4. 中译名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室师资博士后李青所译。

③Liber quadripartiti Ptolemaci et centiloquium eiusdem; Hermetis centilogium et de stellis beiberiis; centilogium Betrem et de horis planetarum; eiusdem de significatione triplicatum ortus; propositiones Almasoris; Zahel de interrogationibus; Messahallac de receptionibus planetarum, de interrogationibus et de revolutionibus annorum, venetiis, 1502, 5. 中译名由李青所译。

在《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一书中提到,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的随团大学生戈什克维奇(И. А. Гошкевич)^①在北京期间,为葡萄牙传教士藏书作了书目^②。在《俄罗斯汉学史》一书注释中说明该书目录藏于俄罗斯联邦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③。这两条线索合起来可以推测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1840-1849年间在京)随团学生戈什克维奇是这份书目的编者。

1838年,在北京的最后一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1800年入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毕学源在京去世。毕学源身后遗留的天主教财产,依其遗嘱交由其故交——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团团长魏若明(В. Морачевич)保管和处理^④。遗嘱中并没有提到藏书^⑤,因此这批书在什么时候、怎样移交给了北京东正教使团,现在很难确定。方豪在谈到这批图书时也提到移交日期已不可考^⑥。从现有中、俄、法、拉丁语资料来看,有三个说法。按惠泽霖的推断,既然毕学源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图书馆,就应当是图书馆的善后事宜已经安排好。一些书中有俄文题识和1821-1830年间在北京的第十届东正教使团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彼得(加缅斯基)[Петр(И. Каменский)]的签名,落款时间是1828年4月和5月,说明此前图书馆便已移交^⑦。方立中(J. Van den

①约瑟夫·安东诺维奇·戈什克维奇(Иосиф Антонович Гошкевич, 1814-1875),1839年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随团学生来到北京。

②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③斯卡奇科夫著,米阿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

④关于天主教遗留财产的处理,详见柳若梅:《19世纪葡萄牙天主教在华遗留财产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载《行政》(澳门)2012年第1期,第109-121页。

⑤毕学源遗嘱内容如下:“请求尊敬的俄国神甫韦尼阿明——若其不在,则请求其继任者——在我死后为我依例举行葬礼;同时,将南堂墓地托付于他,以便保管和实行必要之修复;此外,在我死后请其将在我房中能找到的物事进行变卖,所获资金交给我的国家,交至负责人手中。毕学源立于1830年7月6日。”见J. Van den Brandt, L'Archimandrite Benjamin Morachevich et la fin du Nan-T'ang,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400 (June-October 1948), p. 451. 中译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全慧老师翻译。

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之《北堂图书馆藏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838页。

⑦惠泽霖原著,李国庆译注:《北堂书史略》,第31页。

Brandt)神父在1948年的文章中提到,“在天主教遭受迫害期间,天主教传教团曾把他们的珍贵物品转移到了东正教传教团,其中有藏书。部分财物被魏若明司祭买下。”^①可以认为方氏的说法与惠氏的推断是一致的。但是,俄文资料并不支持惠泽霖神父的推断。苏联时期著名的汉学史家、目录学家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称:“1838年,在北京的最后一个西欧传教士、1800年入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毕学源在京去世。毕学源生前曾请求魏若明为其死后变卖财产并将所得钱款转交给澳门的葡萄牙教会。在毕学源遗嘱中保存有相关条款。魏若明将毕学源的财产变卖后,托一个中国基督徒将部分钱款转寄往澳门。亚洲司得知此事后,认为此事‘会对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造成很大的危险’,而坚决禁止东正教使团同澳门的一切往来。毕学源去世后,葡萄牙耶稣会的丰富藏书转给了东正教使团,为后来的教士和随团学生广为使用,而其中一小部分较为生僻的天文学书籍,则被运往彼得堡。1860年,由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Н. П. Игнатьев)转给了法国的传教士。”^②虽然该书中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一说法的依据,但作者和编者认为图书馆的移交是在1838年毕学源去世之后,这一说法应该是有依据的。因为斯卡奇科夫的《俄罗斯汉学史》是以档案资料为基础而作,原本卷帙浩繁,只是在苏联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因其中过多的东正教传教士内容而遭大幅删减。另有俄文资料显示,是“在魏若明任团长时间,图书馆(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图书馆——笔者按)突然得到极大丰富,由于中国政府下令葡萄牙传教士必须终止在中国人中间传教,葡萄牙传教士收藏的图书宝库连同天主教会财产转到了东正教使团”^③。魏若明是第十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团长,任职时间是1831—1840年,这个时期与斯卡奇科夫所说的时间一致。但是,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1848年的工作记录中称“此时东正教使团接收了葡萄牙图书馆的天文学藏书,这是波利卡尔普神父作为使团团长的最后一件工作”^④。该书中还提到在波利卡尔波使团(1840—1849年在京)期间,随团学生“戈什克维奇还为葡萄牙传教士藏书做了目录”^⑤。这个时期与斯卡奇科夫的时间有差距,但是按这个说法,1848年俄

①J. Van den Brandt, L'Archimandrite Benjamin Morachevich et la fin du Nan-T'ang,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400 (June-October 1948), p. 456. 中译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全慧老师翻译。

②斯卡奇科夫著,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第210页。

③ *Китайские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и* (中国福音报), № май-июнь, 1939. Стр. 47.

④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第78页。

⑤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第80页。

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天主教图书馆,之后便安排随团学生整理编目,似乎也说得过去。尽管图书馆委托给北京东正教使团的时间只能暂且存疑,但前述介绍的戈什克维奇所撰书目上的信息可以看作是对此的补充。

以上是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接收天主教遗留藏书和1860年归还该批图书的基本情况。相比于1862年的狄仁吉书目、1949年的惠泽霖书目,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这份北堂西文善本书目,是北堂图书首次编目,收入书目的是天主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入华至19世纪上半叶遭驱逐这二百多年间所收藏的西文图书。这三千多部内容丰富、几乎覆盖了欧洲文明各领域成就的图书宝库被传教士用于其在华活动之中,将欧洲的文化成果推广于中国,完整再现了支撑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高峰的知识基础。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蓝本都深藏于这批图书之中,耶稣会教士的其他中文论著如《奇器图说》《名理探》《进呈鹰说》《狮子说》《比例规解》《实有论》等也都源于此,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俄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一大盛事。此外,清代中期天主教在华末路之时将图书财产委托北京东正教教士的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以清朝为中心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俄国、俄国与欧洲的微妙关系。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知名旅葡学者金国平先生的帮助和南京大学历史系黄鸿钊教授的鼓励;文中所使用俄文档案的获得,得益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帝俄对外政策档案馆馆长波波娃女士(И. Попова)的帮助;本文所涉及的拉丁文资料,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专家麦克雷(Michele Ferrero)先生、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拉丁语教师李慧的翻译和帮助,涉及的法文资料承蒙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全慧老师翻译,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柳若梅,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俄文化交流史、俄罗斯汉学、中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